

二五尺牘與 日本書紀所載國書之研究 — 隋唐期中日關係史之一章 —

徐先堯 著

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名譽教授

謝敏聰 校讀・攝影

玄奘人文社會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

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



藝軒圖書出版社

二王尺牘與日本書紀所載國書之研究

——隋唐期中日關係史之一章——

徐先堯 著

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名譽教授

謝敏聰 校讀・攝影

玄奘人文社會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，
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

藝軒圖書出版社

◎本書任何部份之文字或風景照片，如未獲得本社書面同意，
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襲、節錄及翻印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六八七號

二王尺牘與日本書紀所載國書之研究 ——隋唐期中日關係史之一章

(平裝)特價新台幣 380 元

(精裝)特價新台幣 450 元

著者：徐先堯

發行所：藝軒圖書出版社

發行人：彭賽蓮

總公司：台北縣新店市寶高路 7 巷 1 號 5 樓

電話：(02) 2918-2288

傳真：(02) 2917-2266

網址：www.yihscient.com.tw

E-mail:yihscient@ms17.hinet.net

總經銷：藝軒圖書文具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3 號

(台大校門對面，捷運新店線公館站)

電話：(02) 2367-6824

傳真：(02) 2365-0346

郵政劃撥：0106292-8

台中門市

台中市北區五常街 178 號

(健行路 445 號宏總加州大樓)

電話：(04) 2206-8119

傳真：(04) 2206-8120

國際書局

台中市學士路 187 號(中國醫藥學院附近)

電話：(04) 2201-5386

大夫書局

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7 號(高雄醫學大學正對面)

電話：(07) 311-8228

本公司常年法律顧問／魏千峰、邱錦添律師

二〇〇三年一月 增訂再版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增訂再版

ISBN 957-616-690-X (精裝)

ISBN 957-616-691-8 (平裝)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讀者訂購諮詢專線：(02) 2367-0122

二王尺牘與日本書紀所載國書之研究

——隋唐期中日關係史之一章

引言

《日本書紀》第二十二卷，推古天皇十六年（隋大業四年、公元六〇八年）段，載有兩封「國書」。一封爲隋煬帝「遣倭回報宣諭書」，另一封爲倭王「遣隋朝貢使」所呈之「國書」，本文專門討論有關後者之各項問題。至於前者，俟有機會再論述。倭王「遣隋朝貢使」所呈「國書」云：

東天皇敬白西皇帝。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，久憶方解，季秋薄冷，尊何如，想清念，此即如常。今遣大禮蘇因高、大禮乎那利等往，謹白不具。（《舊鈔日本書紀》「推古紀」，東洋文庫藏）。（註一）

【註一】《舊鈔日本書紀》，原爲古代日本正史：《日本書紀》（三十卷、譜系一卷）全卷聞名版本之一，今僅存「推古紀」、「皇極紀」兩本紀，成書於九世紀末期，鎌倉時代成爲卜部氏所藏

筆者曾在《中國與日本》（五七至六一期）中，發表〈隋倭邦交新考〉一文（註二），翌年又在日本一學術雜誌《文化》（二九卷二號）發表〈隋倭國交の對等性について〉一文（註三），主張「倭使朝隋」係「不對等性」之「朝貢外交」，倭王自稱「天子」，與突厥可汗同樣，屬於「偷竊名號」，煬帝「不悅」而予禁令，此係批判東京大學教授西嶋定生博士、早稻田大學教授栗原朋信博士等人所倡之「冊封體制論」及「遣隋使對等性外交論」之誤謬。日本歷史學界之反應尙佳（註四）。當時筆者主張該〈國書〉可疑，並且發現該〈國書〉與《隋書》〈東夷列傳〉倭國段

善本書，世界上最古老之版本也。此善本書，後來因係岩崎家贈與東洋文庫，故今俗稱之爲「岩崎本」。請參照附圖二。

【註二】徐先堯：〈隋倭邦交新考〉，《中國與日本》五七至六一期，台北，一九六四年，十一—十一頁。

【註三】徐先堯：〈隋倭國交の對等性について〉，《文化》，二十九之二，仙臺，一九六五年，八五、九二—三頁。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會發行。

【註四】此兩篇小論發表之後十年之間，承蒙日本專家在學術雜誌或專著上之評介、贊同、引用或指正等，有如左十三篇學術論文及三部單本行：

日本史學會：《史學雜誌》七五之五—《一九六五年の歴史學界》——一九六六年，第三二—三三頁；二〇一頁，二〇三—四頁（新井喜久夫、古賀登共兩篇）。（東京大學文學部內，史學會發行）。

護雅夫：《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》，一九六七年，第二一七—二一八。

渡邊茂：〈古代君主の稱號に關する二・三の試論〉，《史流》八，一九六七年，第四、二十一頁。

坂元義種：《古代東アジアの國際關係》上、下，一九六八年，第二〇—二二頁。

增村宏：《日出處天子と日沒處天子》，《史林》五一之三，一九六八年，第五七頁。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發行。

增村宏：《徐先堯教授の《隋倭邦交新考—倭使朝隋，並非所謂對等外交》，及び《隋倭國交の對等性について》を讀む》—西日本史學會での紹介報告—《鹿大史學》十六號，一九六八年。（全篇十頁）

增村宏：《隋書と書紀推古紀》上、下，《鹿兒島大學文學科論集》第四、五號，一九六八—一九六九年，第七三—四，九二—三頁；下，第三七—八，四七，六二—三頁等，引用甚多。

井上光貞、永原慶二編：《日本史研究入門》，東京大學出版會，一九六九年，第二十一頁。

栗原朋信：《日・隋交渉の一側面—いわゆる國書問題の再考察—》，《中日古代史研究》3，一九六九年；全編皆係批判東大教授：榎一雄博士、鹿大教授：增村宏先生及徐先堯三人所謂「不對等說」者。其中，先堯部份，寫在第二六—三三頁。

宮田俊彥：《天皇號の成立は推古天皇十六年（六〇八、隋大業四年）である》。《日本歷史》二六八，一九七〇年，一一八頁。

增村宏：《日出ずる處と日沒する處について》，《鹿大史學》十八，一九七〇年，第二、十八—十九頁。

石母田正：《日本の古代國家》，《日本歷史叢書》，岩波書店，一九七二年，第四二，四〇〇頁。金子修一：《唐代の國際文書形式について》，《史學雜誌》八三之十，一九七四年，五一頁。增村宏：《隋書と日本書紀の遣隋使記事》，《鹿兒島經大論集》十三之三、四號，一九七三年，此篇論文，雖無直接引用我見，但其實與筆者見解相同之處，不少。

岩生成一監修，森克己、田中健夫編：《海外交渉史の視點，一，原始、古代、中世》，一九七五年，第九五頁。

所載〈國書〉：

日出處天子，致書日沒處天子，無恙云云。

在內容上相同，年代亦僅遲一年，但《書紀》編者卻僅載前者，故意隱蔽可靠之後者。此事發生於該次隋倭邦交成立一百一十二年之後，《隋書》問世亦垂百年之後（註五）。《書紀》之編集者恐有取《隋書》所載之〈國書〉而蓄意改造該〈國書〉之嫌。蓋《書紀》編者在編纂時，曾參閱《隋書》一事，業已有定論（註六）。例如《書紀》所載雄略天皇遺詔，全是抄襲《隋書》所載隋文帝之遺詔，即為鐵證之一。但因其時筆者尚未能就該〈國書〉之體裁常用語及其來源等，將該〈國書〉與二王尺牘加以比較研究，故對辻善之助博士主張倭國所贈呈〈國書〉有兩封之

【註五】《隋書》完成於貞觀十年（西元六三六年），但其十志三十卷，完成於貞觀十五年（宋天聖二年《隋書》刊本原跋）；《日本書紀》則完成於養老四年（七二〇年）也（坂本太郎：〈日本の修史と史學〉，一九六九年，十五頁）。

【註六】小島憲之：《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》，上，一九六四年，第二版，一九七二年。

【註七】辻善之助：《日本文化史第一卷》，東京，一九五九年，一六七—八頁；除此以外，尚有《增訂海外交通史話》；一九三〇年，四；〈聖德太子的外交〉；《日支文化の交流（日本文化名著選之一）》，一九三八年等，亦有相同見解。但現在筆者已不能同意如此見解，將在第四章詳述之。

【註八】徐先堯：〈隋倭國交の對等性について〉，《文化》，二十九之二，仙臺，一九六五年，九三頁。

說（註七），未加解析（註八）。

其後，筆者赴日本京都大學研究，寄寓洛西五臺山清涼寺，在該寺之文化研究所有機會教導一位德裔美國學人解讀「二王」（即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）之尺牘，始發現該尺牘與〈國書〉之間，在體裁及常用語句上，頗有相似之處，而懷疑《書紀》編撰人非但仿照《隋書》所載〈國書〉之內容，且亦以二王尺牘爲藍本而加以偽造。此推論如不誤，筆者即可解決該〈國書〉在文字上之錯誤，且亦可探討《日本書紀》編纂人所持之時代意識或國家意識型態，進而可推翻向來以古代日本「天皇」名號在該〈國書〉上業已成立之說，主張在律令時代開始以後或天武朝以後成立始有可能。此項管見之綱要，筆者曾於一九七二年度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發表，並蒙刊載於《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》，一七期（東京，一九七三年）。回國後，稍加整理，成爲〈倭國贈呈隋朝國書之商榷〉一文之第三節：「東天皇敬白西皇帝」（註九）。

本文以客觀立場，擬先由文獻上、政治外交史上、社會經濟文化史上，重新考據二王尺牘東流之時期，特別其上限，然後對「尺牘」與〈國書〉之關係，再加以詳細比較與考據，以期證明

【註 九】《華學月刊》第十五期，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，台北，其時排版順序有錯誤，事後，於第十七期，始訂正之。

管見成立之可能性。對此事實之考據與研討，為戰後日本史學界所忽略。吾人必須揚棄單純之「臆測」或所謂「問題意識」之亂立，而回歸於近代史學所出發之「原點」，亦即明清考據學或西歐「史學革命」(Historiographic Revolution)所帶來之實證史學，而注重其合理主義與批判主義之科學態度(註一〇)，勿以未加嚴密批評之史料而互相爭論。

關於二王之尺牘，筆者所欲考究者，非為「法帖」之書法，而係「書函」之文體、格式、成語等。二王之尺牘，主要收載於如下諸書：

【註 一〇】徐先堯：〈西洋史學史的涵義與課題〉，《史學彙刊》，2，一九六九年，二四三、二四九 1 二五二頁。

現代德、英、法三國大歷史學家，皆異口同聲而疾呼「博學」(erudition)與「考據」在修史工作上之重要性。

Vgl.

Fr. Wagner: *Die Moderne Geschichtsschreibung*, 1960, 2. Auflage, 1977.

H. Butterfield: *Man on his Past*, 1960.

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"history".

In "History", 1955.

The history of writing of history, Xi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 historiques, Rapport, I, Stockholm, 1960.s.27f.

H.I. Marrou: *Quest-ce que l'histoire? Dans L'histoire et ses methodes*, 1961.

唐·褚遂良：《晉右軍王羲之書目》（又名《貞觀書目》或《貞觀目錄》）

唐·張彥遠：《右軍書記》，又名《右軍書語》（《二王書錄》所載）

唐·張彥遠：《大令書語》（《二王書錄》所載）（註二）

唐·王方慶：《萬歲通天進帖》（崔融：《寶章集》；清·王澐校合本）

宋·王著：《淳化閣帖》，卷六至卷十。

明·張溥：《王右軍集》（《漢魏六朝一百二家集》所載）

清·嚴可均：《全晉文》，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卷，第二十七卷。

神田喜一郎等監修：《書道全集》，第四卷，中國，東晉，平凡社，一九六八年。

各書之間，仍有重複或出入。僅《右軍書紀》一書，僅其草書一體即收載四百四十三帖「法帖」（即「尺牘」），由此可知，其全部尺牘為數甚夥。

二王之尺牘在晉代尚未有私函集問世，對於所謂「尺牘」者，係因其書法優美，被當代人奉為藝術品或「法帖」（圖①、③、⑥、⑭），自東晉以來受人珍藏，而逐漸集中於王侯縉紳之手，

【註 十一】以上《晉右軍王羲之書目》、《右軍書記》、《大令書語》三書，皆收藏於張彥遠《法書要錄》

卷三、卷十之中。



附圖① 清·內府本《遊目帖》即《蜀都帖》（日本，安達萬藏藏，二次大戰中被焚）

終于由帝王家秘藏；未幾，又逢東晉末桓玄之叛亂，南朝宋順帝昇明二年（公元四七八年）、梁元帝承聖三年（公元五五四年）及隋煬帝大業十二年（公元六一六年）與宇文化及之篡奪等數次大災殃，失傳於兵火或水災者，爲數不少（註一二）。唐初曾予復刻，其「奕世」流傳過程，可謂多難複雜。自二王在世以來，難免發生模倣與偽造等弊害（註一三），故研究二王之尺牘——特別對其「法帖」，必需經過所謂「史料批判」或「考證」後，始可使用之。對於「法帖」筆法之真偽與「尺牘」文章之內容之考證，主要已有如下諸先賢之業績，可資參考。

唐·張懷瓘：《二王等書錄》（《法書要錄》所載）

宋·米元章：《法帖題跋》、《跋秘閣續法帖》（《東觀餘論》所載）

宋·蘇軾：《辨法帖》（《東坡題跋》所載）

【註 十二】張懷瓘：《二王等書錄》。（《法書要錄》所載）。（吉川忠夫：《王羲之》，《六朝貴族の世界》，一九七二年，第二十一—二十二頁，亦有如是記載）。

【註 十三】王僧虔：《論書》。張懷瓘：《書斷》，羊欣條；《二王等書錄》特別強調二王書法與陳永興寺僧，智永書法之混淆。

曾宏父：《石刻補敘》。

虞龢《論書表》則主張在六朝時，業已有人以所謂「學書」或「戲習」形態而偽造。

宋・黃庭堅：《評釋長沙法帖》（《山谷題跋》所載）

宋・黃伯思：《法帖刊誤》（《東觀餘論》所載）

宋・陳與義：《法帖刊誤》（《重較說郛》所載）

宋・劉次莊：《法帖釋文》（《百川學海》所載）

明・顧從義：《歷代帝王法帖釋文考異》（王常校刊本）

清・王澐：《淳化閣法帖考正》（沈宗騫校刊本）

清・吳省蘭：《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》（乾隆三十八年刊）

日本、中田勇次郎：《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》，一九六〇年，一九七〇年。

其中以中田教授之研究最新，廣徵先人碩學諸說，甚為淵博、精緻，而且時亦有創見，對學界貢獻甚多。雖然如是，但彼等所關心者，係以「法帖」之書道藝術為主，「尺牘」之文學內容為副。換言之，彼等所議論者，係重視真蹟對臨摹、搨摹、鐫刻，或真筆對代筆、偽筆等之問題；對尺牘文章之內容問題，則較為疏忽。事實上，二王尺牘之文章內容，若能克服其「草書體」釋文之困難者，當具有一定之文體、格式等，較易於鑑別，且其文章內容上之修改、「脫字」、偽造，亦較書法上之臨、搨、偽筆為少（註一四）。是故，筆者欲以

附圖② 《舊鈔日本書紀》，（日本國寶），推古紀（東京，東洋文庫藏）

大使言其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
 高祖進之天皇躬屈帝其諱曰東天皇敬
 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
 至又憶方解事秋漢令事何如想清念此
 師如常今遣大禮日高次礼乎耶利善注
 謹白不身是時遣於唐國學生倭漢直福
 自奈雅譯語惠明高漢人云思漸漢大
 國學問僧新漢人曰文南排漢人請要志
 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并人也是
 歲新羅人多化表
 十七年夏四月丁酉朔庚子筑紫大草奏
 上言百濟僧道欣惠弥爲首二十八人俗十
 五之泊于凡後國基北津走時遭難波吉
 士德摩呂私史能以問之曰何表也對曰百
 濟王命以遣於吳國有乱不得入更送於
 本脚忽逢暴風漂涉海中然有大幸而泊
 于靈帝之邊境以歡喜五月丁卯朔壬午
 德摩呂等復奏之則返德摩呂龍二人而
 割百濟人等送本國至于對馬以道人等十
 一甘請之欲留另上表而爲之曰今徒无興
 寺我九月小野臣妹子等妄自大唐唯通
 事福利不表

《舊書鈔日本書紀》，〈推古紀〉（東洋文庫藏版）（圖②）；《日本書紀》，第二十三卷三十卷。

《法書要錄》（琴州張氏藏版，《學津討原》所載，收入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四六，藝文印書館刊行，台北，一九七〇年）。

《隋書》，〈帝紀〉、〈禮儀志〉、〈王劭列傳〉、〈東夷列傳〉、〈北狄列傳〉、〈杜正玄〉、〈正藏列傳〉。

《晉書》，〈帝紀〉、〈王羲之、王獻之列傳〉、〈后妃列傳〉、〈殷浩列傳〉、〈王洽列傳〉、〈孫統列傳〉、〈郗曇列傳〉等。

《世說新語》（楊勇校箋本，台北，一九七三年）（註一五）

【註十四】中田勇次郎教授，亦一再強調王羲之之尺牘雖多，但亦有一定之格式（「書式」）、固定之習慣，獨特之文體、「慣用語句」與類似語等類型，值得參考。《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》，一九六〇年，二五—二六，九一—九二，九五，一五五—一六二頁。

【註十五】東晉·宋·劉義慶（公元四〇三—四四）撰，三卷，梁·劉孝標註：有〈唐寫本殘卷〉，其書名為《世說新語》。

【註十六】日本天平勝寶八年至天平寶字二年（公元七五六—七八年），光明皇后所獻聖武天皇珍寶、遺物之目錄。

《正倉院文書》，〈東大寺獻物帖〉（奈良，東大寺收藏，公元七五六—八年）（註一六）

《萬葉集》，卷一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七、二十（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本）（註一七）

《續日本紀》，卷一—三十六

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，〈太宗至玄宗本紀〉；〈東夷列傳〉、〈鍾紹京列傳〉等

《資治通鑑》，〈晉紀〉、〈隋紀〉、〈唐紀〉。

等爲主要直接史料，以

《王右軍年譜》（清·魯一同編）

《書道全集》，四，東晉（平凡社刊行，東京，一九六八年）。

《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》（中田勇次郎，東京，一九六〇年版）（註一八）及其餘

有關專門著作爲考證、論斷之根據與參考，並且儘量選擇無需考證之尺牘，或利用前人業已考據

【註 十七】《萬葉集》二十卷，係日本最古老詩集，編成於公元七六〇年代，本論文所根據版本，爲橘千

蔭：《萬葉集略解》，八卷，寬政八年（一七九六年），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，一九二五年版。

【註 十八】該書一九六〇年版，係初版本（第二版：一九七〇年）；一九七二年盛夏，於京都西郊嵯峨野，與杉村學兄晉見著者中田先生（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教授）時，爲鼓勵筆者研究，先生親自將其寶貴儲藏品所贈與筆者，僅此誌謝。

之尺牘，以六朝、隋唐中華世界秩序之中日關係史觀點，分爲下列諸章敘述：

第一章：二王尺牘文學之特徵、結構意識問題。二王所生存之東晉時代，爲南北貴族聯合政權下之門閥社會，具有兩元性對立，乃產生「偏安」與「北伐」、「土郡」與「僑郡」、「黃籍」與「白籍」等「現實」與「理想」之矛盾現象。在亂世之矛盾、離合、不安，與江南山明水秀、物產豐饒之背景下，出現瑯琊臨沂望族二王父子所創造之天才「書法」藝術。

第二章：重新由文獻學、文化史、政治外交史、社會經濟史之觀點，考證二王尺牘東流日本之時期——特別其上限，並斷論其與編纂《日本書紀》之關係。

第三章：將《書紀》所載之文章，依照二王尺牘之結構、文體，常用成語等，詳細比較檢討，然後證明前者是否參照後者，並探究其時《書紀》編纂人僞筆潤飾之問題意識。

第四章：重新檢討該〈國書〉所載「天皇」名號成立於推古朝之可能性，以中國正史所載「天皇」名號爲旁證，並提示「日本」新國號成立等新問題。

綜合上述考證作結論，以斷定該〈國書〉之真僞，並解決文字上之疑問，設定若干新問題，特別是隋倭、唐日兩邦交之對等性問題。至於《書紀》所載〈國書〉與上述〈隋帝遣倭回報宣諭書〉及「倭國遣隋朝貢使」蘇因高所失落〈煬帝勅書〉之關係或其真僞問題，另有機會再詳述。